

多元要素市场分割与城市化质量： 基于结构式估计的文献综述

陆军 蔡思远¹

【摘要】要素市场分割既是传统城镇化中城市偏向型制度安排的结果，同时也已成为阻碍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普遍规律表明，要素市场分割降低了城市生产率，造成城市规模体系扁平化，并对城市居民的福利提升具有异质性影响。集聚经济与消费的“拥挤效应”是要素市场分割影响城市化质量的主要机制。本文聚焦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三类要素市场分割，以结构式估计的研究范式为线索，分析要素市场分割对城市化质量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后续的相关研究可从不同要素市场分割的相互传导、区域的异质性影响等方面进行拓展。

【关键词】要素市场分割 城市化质量 户籍制度 土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21)-06-0041(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 提高到 2020 年的 63.89%。已有研究认为，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户籍制度以及城市偏向性的发展政策是中国城市化“奇迹”的重要原因。^[1,2] 尽管偏向型的制度安排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但却形成了要素或商品在市场间流动过程中受到限制或阻碍的现象，即市场分割。^[3] 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分割大大降低了城市化质量。劳动力市场分割催生了“逃离北上广”“用工难”与“返乡潮”等现象的发生；资本市场分割导致城市间的资本成本差异，以及地方政府将“投资限制在本地”；土地市场分割则造成了土地供给在结构上和空间上的严重错配。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后，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应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因此，加强对要素市场分割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为城市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利于提升下一阶段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

不同于传统简约式分析范式(Reduced-form)的研究，本文聚焦于结构式分析范式(Structural-form)下多元要素市场分割的相关研究。结构式估计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参数之间的数量关系，揭示出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然后通过简约式回归来估计所需要校准的参数，构建反事实进行比较，从而评估要素市场分割的影响。本文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种要素入手，以结构式估计的研究范式为线索，梳理并评述要素市场分割与城市化质量的研究进展。具体而言，本文关注城市化质量的四个方面：城市生产率、居民福利、城市规模体系以及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

二、要素市场分割的建模技巧与进展：量化空间模型的视角

下面在区域经济学视角下，主要介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理论模型进展。¹ 在区域经济学中，新经济地理学在长时间内占据了理论模型的主流。但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描述并不充分，原因在于其框架中的迁移成本仅限于城市内部的空间尺

¹作者简介：陆军，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蔡思远，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规模借用驱动的中国都市圈多重循环网络与治理优化研究”(42171174)的研究成果

度，往往被构造为一个与通勤距离成正相关的函数。^[4]然而这一设定并不适用于区域尺度。尽管部分研究在 FE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户籍制度等因素，但其迁移成本要么是人为外生设定的某一数值，要么是完全不能流动的极端状态。^[5,6]一个例外是梁琦等(2013)在贝伦斯和村田的 VES 模型和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将户籍成本内生化的研究，考察了户籍制度对城市规模体系的影响。^[7]尽管新经济地理模型能够从理论上表现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但其参数难以进行校正的缺陷使得基于现实参数的反事实估计难以进行，因而缺乏实际的政策意义。

量化空间模型(Quantitative Spatial Economics Model)的出现为实现基于现实参数的反事实估计提供了可能。^[8]量化空间模型借鉴了大量贸易理论中的建模技巧，将贸易理论中的国家视为区域与城市，从而描述区域内部的商品和要素流动。目前量化空间模型的主流框架建立在 EK 模型的基础上。^[9]不同于传统模型对个体进行建模的框架，EK 模型实质上是对区域间的“流”进

行建模。一般地，假定共有 N 个区域。个体 ω 来自区域 i 且在区域 j 工作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U_{ij}(\omega) = \frac{Z_{ij} V_{ij}}{\mu_{ij}}$ ，其中， V_{ij} 表示来自区域 i 且在区域 j 工作的间接效用，如个体 ω 能够从区域 i 获得土地收入，同时从区域 j 获得工资收入、舒适度等。当个体 ω 无法从区域 i 获得效用时， V_{ij} 退化为 V_j 。 μ_{ij} 为从区域 i 迁移到区域 j 的成本。当 μ_{ij} 越大，即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高。而 Z_{ij} 则用以衡量个体的异质性。该异质性既可以是生产异质性(能力)，也可以是消费异质性(不同区域的舒适度或异质性偏好)。类似地，当该异质性与区域 i 无关时， Z_{ij} 退化为 Z_j 。EK 模型的核心设定是 Z_{ij} 服从 Fréchet 分布。Ahlfeldt et al. (2015) 认为，该分布可表示为 $F(Z_{ij}) = e^{-\Gamma \mu_{ij}^\varepsilon}$ 。^[10]此时根据大数定律，初始状态下位于区域 i 的劳动力向区域 j 迁移的概率 π_{ij} 具有如下解析解，其中 ε 为 Fréchet 分布的形状参数，用以衡量异质性的离散度。

$$\pi_{ij} = \frac{\left(\frac{V_{ij}}{\mu_{ij}}\right)^\varepsilon}{\sum_{m=1}^N \left(\frac{V_{im}}{\mu_{im}}\right)^\varepsilon}$$

其中，迁移成本 μ_{ij} 为外生，需要使用基于现实数据的回归进行校准。从 π_{ij} 的解析式可以发现区域 i 与 j 之间的迁移成本下降不仅影响两地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其他区域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具有间接影响。基于对迁移流的描述，模型能够考察迁移成本对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从数量来看，迁移流的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城市规模体系的变化。同时，城市规模的变化能够通过集聚效应影响城市生产率，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福利。如果将 Z_{ij} 视为个体能力的异质性，服从分布 $F(z_1, z_2 \dots z_d) = \exp(-$

$(\sum_{d=1}^D z_d^{1-\rho})^{1-\rho}$ ，那么还能考察迁移成本对目的地的劳动力技能构成的影响。区域 j 的平均能力为 $\bar{\Gamma} = \frac{\sum_{m=1}^N \pi_{jm}^{1-\frac{1}{\varepsilon}} l_m}{\sum_{m=1}^N \pi_{jm} l_m}$ ，其中 l_m 为

区域 m 的人口， $\bar{\Gamma} = \Gamma \left(1 - \frac{1}{\varepsilon(1-\rho)}\right)$ 。

EK 模型的优点在于能够通过事前假定特定分布来获得迁移流的解析解，从而确定结构式估计的回归形式，故目前绝大部分的量化空间模型都以 EK 模型为基础来刻画劳动力市场分割。尤其是对于异质性主体而言，迁移流严重依赖于劳动力的事前分布，因此采用 EK 模型能够规避无法获得解析解的问题。但 EK 模型的缺点在于其模型设置着重于劳动力的流动，但忽略了企业的进入退出，因此往往会高估拥挤力。^[11]

三、多元市场分割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1. 劳动力市场分割

(1)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市生产率

大多研究表明, 无论对于劳动力的流入地还是流出地, 市场分割改善对生产率均具有提升作用。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较为直接: 首先, 生产效率往往与城市规模正相关, 故市场壁垒阻碍劳动力向更高收入的大城市流动, 使得劳动力无法充分享受集聚带来的正向溢出, 造成生产率损失。^[12, 13] 其次, 劳动力流动壁垒也阻碍了异质性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分类和选择。劳动力之间的正向匹配机制 (Assortative Matching) 表明, 给定自己的能力, 合作伙伴能力越高, 由匹配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也越明显。^[14] 劳动力市场分割降低了劳动力之间的匹配和合作效率, 进而影响城市生产率提升。

Tombe & Zhu (2019) 在 EK 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了区位和行业异质性的流动成本, 建立了以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和劳动力迁移为特征的两部门多地区一般均衡模型。^[12] 与传统文献不同的是, Tombe & Zhu (2019) 没有简单将迁移成本视为一次性的流动成本, 而将其设定为持续的成本支出, 能够更加精确地体现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本质。由于缺乏土地租赁市场, 离开户口所在地的农民工失去了土地所带来的收益, 高昂的移徙成本和限制性的土地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指出, 如果中国将流动成本降低至美国的水平, 人均实际 GDP 能够增长近 13%, 福利将增长 46%。王丽莉和乔雪 (2020) 通过构建包含城市非农业部门、农村农业部门和农村非农业部门的三部门模型, 发现中国在 2000~2005 年间的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了 14.6%, 从而使得经济的总生产率提升 4%。^[13] 进一步的反事实分析表明, 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壁垒下降至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水平时, 城市化水平将提升 14.21%。Byran & Morten (2019) 使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 测度了国家内部的劳动力流动限制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如果将所有的流动限制都移除, 在不考虑异质性的情况下, 城市加总的生产率将提升 22%。^[17]

(2)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市居民福利

劳动力市场分割降低对城市居民福利的影响存在两个不同的途径: 在生产端, 影响主要来源于人口从低生产力城市向高生产力城市迁移, 通过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提升生产率;^[18, 19] 而在消费端, 人口集聚也会带来拥堵效应, 如导致公共服务消费的下降以及城市环境的恶化。^[11] 因此, 在理论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改善对城市居民福利影响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总体来看, 市场分割的改善对加总的劳动力福利具有提升作用。Xing & Zhang (2017) 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 城市规模每扩大 1%, 移民愿意支付 1.7% 的收入来进入该城市, 因此限制大城市而鼓励中小城市的政策取向将造成较为巨大的居民福利损失。Wei & You (2019) 假定劳动力获得户口的概率与其技能高低和城市不同而有所差异。^[22] 研究结果表明, 在 2000~2010 年之间, 取消所有的户口限制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福利增加 15%~30%。在 2010 年时, 由于大城市已经较为接近最优规模, 此时推动这些城市采取更开放的户籍政策可以获得社会效益, 但本地人可能会蒙受损失。^[22]

尽管总体福利有所提升, 但居民福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农村劳动力受益更为显著, 而大城市的居民则可能出现福利受损的情况。Wang & Fu (2019) 建立了一个异质性的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利用 1986~1995 年的数据进行校准后, 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削弱能提升总体的 GDP 和居民福利。^[19] 但不同劳动力的福利改变不同。农村劳动力的福利提升 40%~50%, 但城市劳动力的福利将有所下降。Ma & Tang (2020) 考虑加入了具有内生的企业进入退出特征后, 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导致在国家层面上 0.7%~3.9% 的福利损失。^[11] 具体到特定城市, 将北京、上海和广州市的流动壁垒缩小到全国的平均水平时, 北京和广州的居民福利将上升 9.7%~16%, 而上海市的居民福利将下降 8.3%。原因在于模拟结果表明, 放松流动壁垒将导致上海市面临 600 万人口的净流入, 从而使得拥挤效应大于集聚效应。

(3)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市收入差距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尚少。类似于福利的变化, 理论上这一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城市移民的收入有所上升, 但对于城市的本地居民, 拥挤效应与集聚效应的相对大小是不明确的, 而这个问题也是目前对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关键争议点。少量研究结果表明, 劳动力分割程度下降可能会缩小城市收入差距。

Fan (2019) 从生产端估计了这一影响, 指出在具有商品市场分割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条件下, 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将增加城市(区域)内部的不平等。原因在于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分工的深化, 进而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溢价, 从而扩大城市(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此框架下, 国内贸易成本下降能够作为对外贸易的替代方式, 缩小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的反事实分析表明, 如果将 2005 年不同类型的国内劳动力迁移成本降低至美国的水平时, 劳动力的福利分化将分别降低。当高技能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 福利分化从基准模型的 8.15% 下降到 7.14%。当低技能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 福利分化则进一步下降至 5.78%。但此时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也随之减小。^[25]

而在消费端, 城市规模变化还会通过公共服务供给造成不同户籍的城市人口的福利分化。Wei & You (2019) 发现, 2000~2010 年之间完全取消户口限制会在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产生巨大的分配效应。^[22]虽然所有的移民以及部分生活在一般城市的本地人会生活得更好, 但是生活在福利最高城市的本地人在短期福利方面会减少 5%~20%。而本地人和移民之间分配效应的主要渠道是当地提供公共物品的挤出效应。如, 户籍制度能够通过教育的差异化供给而产生代际影响。当前的户籍体系下, 城市移民没有和当地居民获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进而扩大了人力资本差异。^[27]

(4)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市规模体系

大量研究认为,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城市体系扁平化, 即大城市数量偏少、中小城市数量偏多的直接因素。刘修岩和李松林 (2017) 是较早通过结构式估计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市规模体系研究之一, 其研究考察了房价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市规模体系的影响。^[28]需要说明的是, 该研究关注的是城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而非城乡之间的市场分割。反事实分析表明, 在迁移摩擦和生产率外生的条件下, 当城市之间消除流动壁垒后, 劳动力将进一步集聚到大城市中。而在将迁移摩擦和生产率视为内生后, 中等规模城市将有较多的劳动力流入。居民福利将提升 55.8%。Wei & You (2019) 的反事实结果则表明, 2000 年一线与二线城市的规模明显偏小; 而到 2010 年, 大城市的规模尽管依然偏小, 但已经较为接近最优规模。^[22]

表 1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研究	时间	反事实	城市生产率	城市居民福利	城市收入差距	城市规模体系
Tombe & Zhu (2019)	2000~2005	流动成本降低至美国的水平	-	上升 46%	-	-
Wei & Wu (2020)	2000~2010	完全取消流动限制	-	上升 15%~30%	降低	-
王丽莉和乔雪 (2020)	2000~2005	流动成本降低至东莞和深圳水平	上升 4%	-	-	-
Ma & Tang (2020)	2000~2005	北京、上海和广州市的流动壁垒降低到全国平均水平		北京和广州的居民福利上升 9.7%~16%, 而上海市的居民福利下降 8.3%。	-	-
Fan (2019)	2005	流动成本降低至美国的水平	-	-	下降 12.5%	-
刘修岩和李松林 (2017)	2010	消除流动成本的差异	-	上升 55.8%	-	中等规模城市人口显著

						增加
--	--	--	--	--	--	----

2. 资本市场分割

(1) 资本市场分割与城市生产率

目前来看，关于资本市场分割与城市生产率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仅有部分研究提供了一些辅助性证据。如，Au & Henderson(2006)指出，城市中的国有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本。^[30]相比之下，乡村的民营企业的成本更高。因此，资本市场分割导致了乡镇部门的资金短缺和城市的过度投资的现象并存，资本错配降低了城市生产率的提升。但具体对资本市场分割的量化影响评估及其机制检验尚且缺乏。原因可能在于资本市场分割无法直接影响劳动力的决策，需要通过企业选址和迁移影响劳动力就业，间接影响城市生产率。

(2) 资本市场分割与城市居民福利

资本市场分割扭曲了资本最优配置，使得资本成本较低的城市具有超额的资本供给。城市居民工资增加，进而吸引更多移民。过大的城市规模加剧了拥挤效应，使得劳动力无法配置到低拥挤效应的城市中，从而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陈诗一等(2019)在 Desmet & Rossi-Hansberg(2013)的基础模型上，研究资本市场的空间配置偏差如何影响城市规模体系和居民福利。^[31, 32]资本市场分割还能够扭曲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有效配置，在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加剧居民福利的扭曲。反事实分析的结果表明，消除资本市场分割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约 38%。

(3) 资本市场分割与城市收入差距

资本市场分割能够通过“资本-技能”互补这一机制扩大劳动力收入差距。在短期内，过低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更少的劳动力，因此会同时降低城市和乡镇的劳动力工资。然而从长远来看，城市企业的资本成本更低，将会吸引更多新企业进入城市部门。这种进入效应带来了另一个影响经济中工资分配的重要渠道，即由于新企业的进入提升了城市劳动力需求水平，故城市劳动力工资会随着其更高的需求而增加。而乡镇的企业则具有相对较高的资金成本，从而降低了乡镇工人的工资水平。^[33]因此，资本市场扭曲的存在会通过经济中的企业进入效应而加剧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而目前利用结构化量化评估资本市场扭曲影响的定量研究尚属空白。

表 2 资本市场分割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研究	时间	反事实	城市生产率	城市居民福利	城市收入差距	城市规模体系
陈诗一等(2019)	2005	资本成本在城市之间相同	-	上升 38%	-	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普遍减小
Chen et al. (2007)	1998~2007	-	-	-	-	资金成本低的城市规模更大
Beladi et al. (2019)	1985~2011	-	-	-	增加	

(4) 资本市场分割与城市规模体系

资本市场分割能够通过影响企业的空间选址与行业间的进入退出影响城市人口规模，进而改变城市规模体系。Chen et al. (2017)考察了不同城市间的资金边际成本如何受到政治偏好的影响。^[34]资本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城市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差异。而这一差异源自对地方的不同政治偏好，新任命的地方领导人与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带来有利的资本市场条件。而在得到较好的资本市场条件后，这些城市将会经历更大规模的增长。如果其资金成本下降一个标准差，其在2010年时的人口增长率能增长5%。同时，陈诗一等(2019)也发现，资本市场分割使得劳动力过度流向大城市。^[31]当城市间的资本配置扭曲消失时，城市数量显著增多，而规模则普遍缩小。

3. 土地市场分割

(1) 土地市场分割与城市生产率

从城乡土地分割的角度来看，农业用地的经营权流转能够通过改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选择，提升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Ngai et al. (2019)发现，由现行“要么使用，要么失去”的土地制度导致的就业错配，能够解释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异的25%。^[36]在农地经营权能够流转的情形下，劳动力能够通过土地转让提升农业生产率。^[37]同时，农地流转也能够通过促进农村移民在城市中就业，提升城市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38]

而从区域土地分割角度，土地供给错配通过影响企业选址，降低集聚程度，显著降低了城市生产率。由于东部沿海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率相对于内陆地区更高，如果将内陆地区土地指标的30%重新分配给东部沿海地区，将使得2007~2014年的GDP上升0.06%~0.19%。而如果将低土地生产率城市指标的30%重新分配给高土地生产率城市，那么2007~2014年的GDP将上升0.07%~0.22%。^[39]部分研究考察了土地分配制度改善的政策效果，如跨区域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能够显著减缓土地利用效率损失。^[40]相较于不存在土地差异化定价的情形，土地市场分割使得城市生产率下降了0.4%。^[41]

(2) 土地市场分割与城市居民福利

土地市场分割通过改变企业选址，从生产端影响劳动力就业与收入，从消费端影响居民的住房成本，进而损害城市居民的福利。从生产端来看，Yu (2020)指出，土地红线政策减少了城市中制造业部门的土地供给，造成土地跨区域和部门的错配。^[42]同时，土地供给不足还扭曲了城市劳动力的配置。此时尽管城市生产率高，但劳动力被迫生活在低生产率地区。通过这两个机制，土地分割导致城市居民福利下降了6%。Fei (2020)的反事实分析表明，土地市场的扭曲使中国的整体福利减少了0.8%，且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都存在一致负向的影响。^[41]

而从消费端来看，土地市场分割能够直接影响城市的住房供给。违背人口流向的指标式土地供给模式加上偏向工业用地的土地配置模式使得大城市的住房供给受到严重压缩。^[44]Hsieh & Moretti (2019)从该角度考察土地供给分割对居民福利的影响。^[45]具体而言，放松部分大城市的住房供给限制后能够有效居民福利增长率提升约50%。段巍等(2020)基于Rosen-Roback的基础模型，推演了省会首位度提升的政策影响。^[46]反事实分析表明，省会及副省级城市用地指标分别增加10%时，城市福利水平却下降了0.3%~0.35%。户籍制度造成的人口和土地要素的分离是城市福利下降的主要原因。

对于农村劳动力，城乡土地市场的分割还会直接改变劳动力的迁徙决策。由于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和出售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在进城后往往会安排配偶或亲戚来照看他们的农田，这也导致中国的农村移民更加倾向于到离家乡更近的城市去。为了使迁徙的距离下降10%，他们愿意放弃15%的收入，从而使得福利遭受损失。^[47]周文等(2017)构建了一个包含城乡异质性劳动力迁移和土地流转的理论模型，用以考察城乡间土地市场分割的影响。^[48]反事实分析表明，当1单位的农村宅基地能够置换0.5单位的城市建设用地时，城市内部的福利差距显著降低，新进入的城市移民福利水平上升200%左右，而城市原有劳动力的福利则下

降 9.9%。

表 3 土地市场分割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研究	时间	反事实	城市生产率	城市居民福利	城市收入差距	城市规模体系
Fei (2020)	2013	消除不同企业的土地价格差异	下降 0.4%	下降 0.8%	—	大城市与小城市增长，而中等城市人口流出
周文等 (2017)	2000、2011	1 单位的农村宅基地能够置换 0.5 单位的城市建设用地	—	—	下降	—
Fu et al. (2019)	2007~2014	低土地生产率城市指标的 30% 重新分配给高土地生产率城市	上升 0.07%~0.22%	—	—	—
Tombe & Zhu (2019)	2000~2005	存在有效的土地租赁市场	—	上升 12%	—	—
Hsieh & Moretti (2019)	1964~2009	放松大城市的住房供给限制	—	上升 50%	—	—
段巍等 (2020)	2010	省会及副省级城市用地指标增加 10%	—	下降 0.3%~0.35%	—	—
Yu (2020)	2010	不存在土地红线政策	—	下降 6%	—	—

(3) 土地市场分割与城市规模体系

土地市场分割直接改变了企业选址，因此对于城市规模也存在直接且异质的影响。不同企业类型所面临的土地价格不同，故未受到“土地补贴”的部分企业无法充分向大城市集聚，享受选择和集聚的正溢出效应。Fei (2020) 量化了土地市场的摩擦对城市规模体系的影响，发现潜在的土地错配可能源于对外资企业的“税收”，而不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进一步地，不同类型企业的价格“楔子”使得企业的区位选择发生改变。如果按照城市规模将城市分为五级，那么在消除土地市场分割后，人口规模最大的四、五级和规模最小的一级城市将实现增长，而中等城市的人口将流出。^[41]

除了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城乡土地分割还会对城市住房供给产生影响。土地市场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导致城市住宅用地供给不足。邵挺 (2010) 在 Krugman-Helpman 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不足推升了房价，从而挤出部分劳动力，使得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扁平化。^[50]

四、新型城市化阶段的市场一体化之路：未来展望与研究启示

要素市场分割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改变了区域间和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人口城市化

的进程因此受阻。而土地市场分割和资本市场分割则改变了城市产业集聚和与区域间的企业迁移,从而影响土地城市化的进程。总体而言,以结构式估计为基础的研究数量尚且不多,但却悄然兴起。大多研究均表明,要素市场分割降低了城市生产率和居民福利,扩大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并改变了城市规模体系。而在新型城市化阶段,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仍然是提升城市化质量、重塑经济活力的重要抓手。

从研究范式来看,相关的实证研究范式也经历了从简约式估计向结构式估计转变的过程,基于现实数据的结构式估计方法逐渐增多。结构式估计优点在于结果相对可信,而且能够评估各个传导机制的影响,但对参数要求较高。而简约式估计则对数据要求量小,但所估计出的政策效应难以外推。同时,简约式估计中的传导机制需要额外进行识别,不如结构式估计可信。可见,随着数据可得性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基于现实数据的结构式估计将成为研究主流。

随着理论不断完善和方法的创新,要素市场分割的研究还将延伸到更为广阔的领域。结合研究现状,笔者认为,未来要素市场分割的研究可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突破,以此为推进新型城市化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参考。

1. 不同要素市场分割的相互作用

目前,大量研究聚焦于某一特定要素市场的分割及其影响,而忽略了不同要素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性,因此某一要素的市场分割也将影响其他要素的使用。一些文献初步探讨了相关机制。如,土地市场分割能够通过加剧就业错配,从而恶化劳动力的市场分割。Hsieh & Moretti (2019)发现,当地城市对住房的限制性供给也会阻碍劳动力更有效地流动。^[45]反过来,劳动力流动结果也将影响土地指标的跨域分配。因此,构建多种要素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不同要素市场之间的作用机制是进一步准确评估要素市场分割影响的重要基础。

2. 要素市场分割的区域异质性影响

在简约式回归中,所估计出政策效应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但简约式估计却难以得出特定地点的政策效应。换言之,区域之间严重的异质性使得估计出的平均效应无法外推到特定地区。事实上,区域异质性会导致不同地区的市场分割影响差异巨大。如, Ma & Tang (2020)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的影响还依赖于交通设施网络的分布。^[11]劳动力流动的最大收益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城市,而是与大城市的交通网络密集发达的周边城市。这些城市能够通过城市间的商品贸易享受大城市的发展成果,而不必承担大城市的拥堵成本。一个解决的思路是,利用结构式估计,识别出不同城市所对应的参数,从而识别出城市间的异质性。

3. 要素市场分割的拓展研究

在多元要素市场分割的研究中,仍有大量话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一,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已有研究中大多没有考虑政府角色,政府的目标函数以及政府对于教育、医疗的公共服务定价依然是黑箱。除了户籍制度,人口疏解、人才补贴等劳动力政策亟待新的研究进行评价。第二,已有模型大多是静态的。但对于劳动力而言,子女的教育和生活的考虑是其迁移决策中的重要因素。由静态模型转为动态模型也是未来相关理论的突破口,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土地市场分割,已有的思路集中在土地市场分割对企业空间行为的影响,而对于企业的产业行为以及宏观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亟待进一步深入;已有理论模型中政府的角色一直是空白。将地方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引入,并构建政企合作与政企合谋的一般模型框架,可能会对已有的一些结果产生冲击;针对一些土地政策,如跨域的土地指标调节、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影响的政策评估空白也需要进行填补。

关于资本市场分割,已有研究大多也集中于其对企业选址的影响。而对于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如企业的购地、投资、就业

创造等微观机制的研究则往往被忽略。通过“资本-技能”互补这一机制，更多的结构式估计的量化研究亟待填补该领域的空白。

参考文献:

- [1]陈斌开, 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04):81-102.
- [2]陈钊, 陆铭.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4, (06):50-58.
- [3]曹春方, 周大伟, 吴澄澄, 等. 市场分割与异地子公司分布[J]. 管理世界, 2015, (09):92-103, 169, 187-188.
- [4]Brinkman J C .Conges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6, 94(06):13-31.
- [5]安虎森, 颜银根, 朴银哲. 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 促进或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悖论的一个解释[J]. 世界经济文汇, 2011, (04):41-54.
- [6]刘军辉, 张古. 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模拟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J]. 财经研究, 2016, (10):80-93.
- [7]梁琦, 陈强远, 王如玉. 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2):36-59, 205.
- [8]Redding S J, Rossi-Hansberg E. Quantitative Spatial Economics [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7, 9(01):21-58.
- [9]Kortum E S .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J]. Econometrica, 2002, 70(05):1741-1779.
- [10]Ahlfeldt G M, Redding S J , Sturm D M , et al. The Economics of Density: Evidence from the Berlin Wall[J]. Econometrica, 2015, 83(06):2127-2189.
- [11][20][24][52]Ma L , Tang Y . Geography, Trade,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20, 115:103181.
- [12][15]Tombe T , Zhu X . Trade, Mi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05):1843-1872.
- [13][16]王丽莉, 乔雪. 我国人口迁移成本、城市规模与生产率[J]. 经济学(季刊), 2020, (01):165-188.
- [14]Eeckhout J , Kircher P . Assortative Matching with Large Firms[J]. Econometrica, 2018, 86(01):85-132.
- [17]Bryan G , Morten M . The Aggregat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 127(05):2229-2268.
- [18][21]Xing C , Zhang J . The Preference for Larger Citi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ural-urban Migrant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3:72-90.

[19][23]Wang S X ,Yu Benjamin F .Labor Mobility Barrier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 53:211-224.

[22][26][29]Wu W,W You.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Internal Migration Restrictions:Evidence from China[R]. Working Paper, 2019.

[25]Fan J. Internal Geography,Labor Mobility,and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2019, 11(03):252-288.

[27]Sieg H.,C.Yoon,J. Zhang.The Impact of Migration Controls on Urban Fiscal Policie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in China[R].NBER Working Paper,2020.

[28]刘修岩, 李松林. 房价、迁移摩擦与中国城市的规模分布——理论模型与结构式估计[J]. 经济研究, 2017, (07):65-78.

[30]Au C ,Henderson C.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6, (03):549-576.

[31][35]陈诗一, 刘朝良, 冯博. 资本配置效率、城市规模分布与福利分析[J]. 经济研究, 2019, (02):133-147.

[32]Desmet K,Rossi-Hansberg E.Urban Accounting and Welfare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06):2296-2327.

[33]Beladi H ,Chao C C ,Ee M S ,et al.Capital Market Distortion,Firm Entry and Wage Inequality[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9,56:101312.

[34]Chen Y,Henderson J V,Cai W.Political Favoritism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s and Its Effect on City Sizes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7,98:69-87.

[36]Rachel N L ,Pissarides C A ,Wang J .China's Mobility Barriers and Employment Allocations[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9,17(05):1617-1653.

[37]冒佩华, 徐骥, 贺小丹, 等.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 理论与实证[J]. 经济研究, 2015, (11):161-176.

[38]周京奎, 王文波, 龚明远, 等. 农地流转、职业分层与减贫效应[J]. 经济研究, 2020, (06):155-171.

[39]Fu S ,Xu X ,Zhang J .Land Conversion across Cities in China[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21, 87(04):103643.

[40]邵挺, 崔凡, 范英, 等. 土地利用效率、省际差异与异地占补平衡[J]. 经济学(季刊),2011, (03):1087-1104.

[41][43][49]Fei X .The Misallocation in the Chinese Land Market[R].BOFIT Discussion Papers,2020.

[42] Yu Y. Land-Use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he Farmland Red Line Policy in China[R]. Working Paper, 2020.

[44] 余吉祥, 沈坤荣.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逻辑及其对住房市场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9, (04): 116-132.

[45] [51] Hsieh C T, Moretti E. Housing Constraints and Spatial Misalloc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9, 11 (02): 1-39.

[46] 段巍, 王明, 吴福象. 中国式城镇化的福利效应评价(2000—2017)——基于量化空间模型的结构估计[J]. 经济研究, 2020, (05): 166-182.

[47] Zhang J, Zhao Z. Measuring the Income-Distance Tradeoff for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R]. IZA Discussion Papers, 2013.

[48] 周文, 赵方, 杨飞, 等. 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 理论与模拟[J]. 经济研究, 2017, (06): 183-197.

[50] 邵挺. 二元土地市场、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结构体系的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注释:

1 针对土地和资本市场分割, 目前研究多使用价格扭曲系数 τ 来刻画, 并没有构建出专门的理论模型。

2 一般在区域空间尺度上会如此设定, 而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尺度上则设定为 V_{ij} 。